

出版说明

为了配合文艺界、电影界的斗批改，我们和兄弟组织于1967年5月编成了这份大事记的初稿，1967年9月又进行了一次大修改，增加了三分之二的新材料，由初稿的7万字增加到12万字。经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社会印件办公室批准印行。

北师大井网潮

1967年12月

最高指示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

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养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摘自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

前 言

在偉大的历史文件“5.16”《通知》中，毛主席发出了偉大号召：全党必须“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今天，当我们满怀豪情壮志，隆重纪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时候，回顾建国十八年来，电影战线两条路线的斗争，何等尖锐复杂！何等惊心动魄！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利用文艺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列宁说：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以刘少奇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抓住电影这个极其重要的阵地不放，刘少奇的忠实走卒周扬、夏衍等篡夺了电影界的领导权，一条与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根本对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整个电影界乌云翻滚，群魔乱舞，“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从《清宫秘史》、《武训传》到《北国江南》、《林家铺子》、《早春二月》、《燎原》，银幕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宣传阵地，从《电影的锣鼓》、《创新独白》到“离经叛道”论，极其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

想，大肆散布封、資、修和三十年代毒素，他們还招降納叛、結党营私，搜罗了大批叛徒、特务、牛鬼蛇神，窃踞电影界各部門、各单位的领导职位，結成了一支反革命的队伍，瘋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妄图“一旦时机成熟”，就“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十分关心电影战綫两条路綫的斗争，建国初期，就多次指出卖国主义影片《清宮秘史》應該批判，并亲自领导了对反动影片《武訓傳》的批判，以后，又对电影工作作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指示，照亮了我国电影事业的道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們敬爱的林副統帥以及周总理、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柯庆施同志等高举毛澤东思想偉大紅旗，同以刘少奇为总后台的电影界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綫进行了艰苦卓絕的斗争，保卫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綫，取得了极其偉大的胜利！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揚、林默涵、夏衍、陈荒煤一伙以及他們的总后台中国的赫魯曉夫刘少奇揪出来了，把他們所搜罗、包庇的叛徒、特务、牛鬼蛇神揪出来了。这个偉大的政治上的胜利，宣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綫的彻底破产，为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綫的贯彻扫清了道路。

今天，我們紀念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定要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的旗帜，把中国的赫魯曉夫刘少奇批倒批臭！把以刘少奇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綫批倒批臭！把电影界的领导权夺过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让毛澤东思想的偉大紅旗在电影战綫上高高飄揚！永遠飄揚！让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在銀幕上大放光彩！永放光彩！

1967年5月23日

第一部分(1948年—195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从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国内基本矛盾。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成为两个阶级斗争的焦点。盘踞在电影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总后台刘少奇，利用电影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反动影片《武训传》的批判，这是建国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对资产阶级进攻的第一次大规模回击。

一九四八年

11月 毛主席在《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文中，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团结一切革命力量，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统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国。”

11月4日 蒋介石国民党为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在蒋匪喉舌《中央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紧接着，替美帝国主义和蒋家王朝招魂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11日至19日在香港上映。

11月16日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以旧中宣部名义向东北局宣传部发出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闭口不谈电影为夺取全国胜利的政治斗争服务，却鼓吹反“题材决定”论，说什么“电影剧本故事的范围”，“可掺合国民党统治区的、外国的、古代的”。“指示”还宣传“无害有益”论，说“还有一些与政治无关系的影片，只要在宣传上无害处，有艺术上的价值就可以”。这个黑“指示”，是一

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在此以前，1946年接收伪“满映”后已建立东北电影制片厂，原在长春，后迁往兴山。当时由于条件困难，还不能生产大型故事片。此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电影事业也面临一个大发展的局面，陆定一之流赶快加紧了控制。

12月30日 毛主席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英明指出：“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

一九四九年

3月5日——13日 在中国人民革命全国胜利的前夜，党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在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又指出：“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毛主席要我们必须警惕和预防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毛主席的这个报告，具有极其伟大的历史意义。

4月 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对天津文管会负责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闾西、陈荒煤等说：“宣传封建，不怕，几千年了，我们不是胜利了？和尚、尼姑都不禁了，还禁戏！旧的东西总会死亡的，怕什么！《四郎探母》可以演，禁了，人家又不知道这些汉奸戏了。”又说：“对书报、戏剧、电影的审查尺度要放宽，否则会

使很多人失业。”为此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坏影片的泛滥打开了闸门。

在这个期间，刘少奇在天津还胡说：“对文艺界问题，不必看得太严重，中国人看美国电影看了几十年，中国革命还不是胜利了。”他还指责：“我们的报纸有偏向，光说工人好，说资本家不好，资本家有好的也不说。”刘少奇还公开鼓励资本家发展资本主义，竭力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说什么“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的将来的事情”，“将来到中国的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赤裸裸地道出了他要把新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

4月 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策划下，在香港由文化特务于伶出面，召集瞿白音、张骏祥、史东山、邵荃麟、蔡楚生、叶以群等牛鬼蛇神，炮制了一个维护私营厂，反对电影审查制度的所谓“人民电影建议书”。这是妄图扼杀年轻的人民电影事业的反革命宣言书，是一个顽固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黑纲领。

4月20日 北平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伪中央电影企业公司第三场。而后正式成立北京电影制片厂。

5月 上海解放前夕，夏衍从北京赶赴丹阳，接受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和反革命分子饒漱石的反革命指示，准备接管上海文教工作。上海解放后，夏衍先后窃踞文管会负责人、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等职位，并安插大小爪牙、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控制了上海的电影事业。

6月2日 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国民党经营的各电影厂。11月16日正式成立上海电影制片厂，于伶窃踞第一任厂长，把持我国最大的电影基地。

6月15日 毛主席在新政协筹备会上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6月30日 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专政》这一伟大著作中指出：“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項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統治方法，他們就不能維持政权，他們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

7月2日——19日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7月6日，我们的伟大領袖毛主席亲臨会場，对全国各地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寄予极大的希望。

周恩来同志作政治报告。他强调指出：“我们应该感谢毛主席，他给予了我们文艺的新方向，使文艺也能获得伟大的胜利。”他号召革命文艺工作者，要写作，“就一定不要忘记表现这个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人民军队”，表现中国农民的“勇敢、勤劳、艰苦、朴素的本质”，同时应该使工人阶级“成为我们的文艺的重要主题”。

陈伯达同志在讲话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的最好的結合，文艺工作者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

在周扬等人的授意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阳翰笙作了所謂《国统区进步的戏剧电影运动》的报告，大肆吹捧三十年代电影获得了“空前未有的辉煌的成就”，鼓吹有了一个“戏剧电影上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指出人民大众斗争的道路”。妄图为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翻案，以三十年代文艺黑线抗拒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

7月12日 夏衍在上海文管会召开的编导座谈会上猖狂反对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他叫嚣：“我们还不可能一定要城市的人只看农民工人，也不可能叫城市的剧作家去写乡村。所以上海的文化工作者，可以写他自己所了解的东西”；他还提出“无害论”，说：譬如“夏天的汽水，咖啡，虽然没有滋养作用，但并没有害处，那也可以”。

在此期间，夏衍还在各种场合，鼓吹“分工论”，提出所謂“东影”、“北影”表现工农兵，“上影”表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同日 根据刘少奇“审查尺度要宽”的黑指示，于伶在编导座谈会上宣布上海电影审查机构成立，说明“审查尺度要宽”，订出投降主义

的原则，使一大批中外反动影片，如《十三号女盗》、《复活》、《夜莺曲》、《乱世孤雛》、《空谷芳草》、《剃刀边缘》、《海底肉弹》等继续泛滥，配合了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垂死挣扎。

7月——8月 电影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史东山提出“应当不只是写工农兵”，“对于为工农兵的利益而参加斗争的同盟军”，“也应该加以鼓励和表扬”。他主张写“恋爱与革命相结合”、“大打出手”、“机关布景”和“噱头”之类的东西。此后不久，上海《文汇报》展开所谓“要不要写小资产阶级”的讨论，文艺界、电影界的一批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叫嚣：“在政治上”“既然要团结小资产阶级，在文艺上，就不能也不应该完全地不照顾到他们”。他们借口“政治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市民小资产阶级“急需要正确的教育、健康的精神食粮”，公开打出“为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写作”的口号，公然歪曲毛主席的文艺方向说：“表现现阶段四大阶级的——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人物的事情，就是毛主席的文艺方向”。共同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文艺路线。

8月 夏衍在上海影剧演员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中反对毛主席文艺路线说：“虽然我们提出为工农兵的口号，可是这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而逐步做到，所以创作的范围并不限制得那么狭。”

8月 毛主席在为新华社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对于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评论中英明地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结束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

9月21日 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讲话，指出：“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我

們務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9月26日 上海《新民晚报》载：影院业要求取缔美英反动影片，建立检查制度，肃清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夏衍化名黄洁在《新民晚报》发表《有步骤有计划》一文，咒骂：“‘好心’有时候也会做出‘坏事’”，“且不说要禁绝一切有害美国片，即使退一步讲实施检查吧，流行在全国的英美片有几千部之多，恐怕政府的文教机关在百忙中也难于执行这一任务”。夏衍还说如禁映了英美片，“那么用什么供应全国电影院？”夏衍抬出了刘少奇的黑指示：“在一个时期内，恐怕对检查的标准也不能定得过分严格”。

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10月 在旧文化部领导下，旧中央电影局正式成立。袁牧之任第一任局长。周扬窃踞旧中宣部副部长兼旧文化部副部长，直接掌握全国电影事业。上海这个最大的制片基地继续由他的死党夏衍控制。

10月25日 毛主席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又一次对革命文艺工作发出伟大号召。

12月14日 周扬在旧文化部电影局首届行政会议总结会上讲话，把刘少奇和毛主席并提，并大捧刘少奇和反党集团大头目高岗。说刘少奇“是由群众出发，完全代表群众的”，“对群众的感觉非常敏锐”，因为他“了解群众的要求，所以就善于掌握群众的情绪”。还说：“今后，我认为剧本的取材范围应该广泛一点……，比如，高岗的报告——《荣誉是属于谁的？》写出来一定是很好的题材。”

一九五〇年

1月 夏衍、于伶等人连续几次召开座谈会，提出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没有来得及拍完的《武训传》“仍然有摄制价值”。胡说这部反动影片是“歌颂忘我的服务精神，提高民族自信心”，是为了“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于是，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极力支持，并给予贷款，使反动影片《武训传》在私营昆仑影业公司重新投入摄制。

春夏衍接受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陈鲤庭的建议，在上海创立“电影文学研究所”，按好莱坞办法，搞所谓资料卡片，收买故事、素材，然后请编剧根据资料闭门造车，为私营电影制片厂提供文学剧本。这种腐朽透顶的好莱坞式的创作机构，居然堂而皇之“创立”在解放了的中国，真是咄咄怪事！

3月——4月 一时被吹捧为“历史宫闈巨片”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在北京、天津等地上映。

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刘少奇却大唱反调，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乔木等说，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胡乔木操纵某些报纸也发表影评吹捧光绪“是一个有爱国思想的皇帝”。

陆定一、周扬等和他们的主子一唱一和，极力赞扬《清宫秘史》。

江青同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曾说《清宫秘史》很坏，应该进行批判。在旧中宣部一次会上，江青同志又提出要批判《清宫秘史》，但却受到陆定一、胡乔木、周扬的百般抵制，胡乔木在会上有恃无恐狂妄叫嚷：“少奇同志说的，这是部爱国主义的影片，不能批判！”

经毛主席批评，胡乔木等表面承认错误，在5月3日被迫通知停映《清宫秘史》，但实际上仍然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不对《清宫秘史》进行批判。一场关系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重大政治斗争，就这样被刘少奇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手扼杀了。

5月7日 故事片《内蒙春光》因与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抵触，下令停映。旧文化部召开座谈会，周总理到会讲话。周总理除指出影片的错误外，特别提出了电影工作的领导问题是值得重视的。电影是群众性的艺术，它的影响太大了。所以一部影片如果政治上有错误，在群众中间就要发生坏影响，首先我们干部的工作做法就要受到影响。要加强领导，提出要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的组织。

5月16日 夏衍化名一芹在《新民晚报》发表《电影偶感》，为电影公司老板打气，抬出刘少奇的话来说：“大门的钥匙已经捏在自己的手里”。从刘少奇到夏衍将要扼住大门，为电影公司老板赚钱发财、发

展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复辟舆论卖力。

6月23日 毛主席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闭幕词中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是推动大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很好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毛主席庄严号召：“我希望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都采用这种方法。”在毛主席领导下，全国知识界掀起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

6月 全国遵照毛主席关于实施土地改革法命令，展开了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也相继展开。

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大肆宣扬“保存富农经济”，说这“不是一种暂时的政策，而是一种长期的政策”。他在一月份还曾“指示”“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主张发展三马一犁一车式的富农。

在这种反革命论调的指导下，本年8月出现了坏电影《农家乐》，鼓吹个人发家致富的资本主义道路。密切配合了刘少奇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向党和毛主席发起的猖狂进攻。

7月 夏衍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组大会上说：“1931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最初成立了地下的电影小组”，“回忆起来中国人民的电影事业，是一部辛酸的斗争历史”。大捧三十年代电影。

7月11日 由有关部门组成的电影指导委员会成立。江青同志担任委员会委员，对陆定一、胡乔木、周扬等人所代表的文艺黑线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对社会主义电影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9月8日 电影指导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主要讨论1951年制片计划草案。会上就电影题材及其他重要问题，江青同志同胡乔木等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胡乔木借口“军事片现在计划的题材是多少年逐步才能做到的”，反对把这样的重大题材做为“故事片的方向”。他说：“对于艺术品的作用，只看到了其中的一个方向，没有能够看到人民对于艺术作品的整个的要求”，“就使我们的作者投到一个漩涡里，使作家完全陷于被动，叫艺术家创造的勇敢完全屈服了”。叫嚷“不能要

求作家写他不熟悉不知道的事物”。胡说：“有的政策事件本身是重要的，但并不适于在艺术作品中得到全盘反映”，否则就是对作品的作用理解“狭隘”，“不近情理”，“产生的作品也决不会感动人”。他说：“尽管政治意识如何正确，如果有谁剥夺了艺术家高度的想像力，那就剥夺了艺术家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份”，“这样完成的作品是不足以感人的”。他还鼓吹反“题材决定”论，胡扯“条条道路通到共产主义”。江青同志针对胡乔木的谬论，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意见，要求电影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求表现三大战役，指出在军事影片方面迫切需要的是属于政治工作方面的巩固国防军、建立国防军的电影。而明年最需要的是鼓励每个战士来当国防军，说明大敌当前，美帝国主义所挑拨的战争危机还未被消灭。所以明年在军事题材的影片中最要紧的是打垮蒋美武装的这一阶段的片子。教育我们的人民和战士，我们是已经经历过艰苦斗争与战胜过蒋美强敌的。我们不畏任何侵略者来挑动战争。

9月 坏电影《荣誉属于谁》拍摄完成。这部影片是在周扬授意下，按照反党大头目高岗的文章炮制的，它大肆宣扬荣誉属于照搬苏联调车法的铁路局长，全然否定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创造，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无产阶级司令部批评了这部影片。但是周扬却竭力抗拒，竟在1954年指令将影片做一点小缝补，改头换面，更名《在前进的道路上》，出笼上市。

10月 由于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支援朝鲜人民，打击美国侵略者，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在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和影院职工的坚决抵制下，被刘少奇和文艺黑线保护而在解放后继续泛滥的美国反动电影，终于从中国银幕上被彻底清除出去！

11月16日 夏衍的同伙、叛徒陈白尘在为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一周年写的纪念文章中说：“面对着目前尚以城市市民为主要观众对象的新区情况，瞻望着未来的广大的工农兵观众如潮涌现的远景”，“是守株待兔等候他日的观众呢，还是步步为营先争取今日的观众？是提高到国

际水平呢，还是照顾农民的水平？”猖狂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要电影迎合小市民和国际资产阶级的需要。

11月 夏衍亲自炮制的大毒草《人民的巨掌》正式上映。影片歪曲党的肃反政策是宽大无边，为反革命翻案，恶毒地诬蔑人民解放军和公安人员。这部毒草一直未受到严肃的批判。

12月 反动影片《武训传》拍摄完成。周扬审查通过。周扬说：“我看，很好嘛！我看的时候还流了眼泪。”

12月底 反动影片《武训传》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上映。报纸和刊物大肆吹捧这部影片“有着丰富的思想性”，“强烈的教育性”；胡说武训是什么“劳动人民的伟大典型”，是“足以师法和衷心崇敬的先哲”；胡说武训精神是“始终如一不避任何艰苦困难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教育为人民’的伟大精神”。一派反动叫嚣。

一九五一年

1月9日——2月28日 刘少奇先后两次复信东北、上海、北京三制片厂的翻译片工作者，说：“苏联电影艺术，三十年来就一直与资产阶级艺术潮流在战斗着”，“要学习苏联电影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散布对苏联电影的迷信。

1月11日 周扬在1950年工作总結会议上竭力美化三十年代文人说：“一些新区作家继承了五四以来传统，经过改造，有了转变，我们低估他们的进步是不对的。”并叫嚣要“培养新的明星”，替资产阶级电影明星制摇幡招魂。

2月1日 中国影片经理公司成立。1953年底改名为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2月 《武训传》上映后，立刻被毛主席发现问题。江青同志通知周扬，《武训传》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电影，必须批判。还没有说到毛主席的意见，周扬就气势汹汹地进行反扑，恶毒地说：“有点改良主义有什么了不起嘛！”充分暴露周扬一开始就抗拒对《武训传》批判的真面目。

3月8日 在全国二十大城市举行国营厂新片展览月，集中展出了

1950年国营厂出产的二十六部影片，这些影片绝大部分是表现工农兵斗争的，其中包括《钢铁战士》、《中华女儿》、《白毛女》等影片。

3月24日 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发出通知，决定以《荣誉属于谁》与《武训传》两部影片做反面教员，教育电影工作干部、文艺工作干部和观众。对《武训传》和《荣誉属于谁》两部影片组织讨论与批判。

4月7日 丑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形象的坏影片《关连长》上映，受到了革命群众的强烈反对。但是窃据上海市副市长的反革命分子潘汉年，竟在一次会上说：“譬如为工农兵服务，《关连长》就很好，写兵的，私营厂拍出这样的好片子不容易，现在报上还有人批评。”

在此前后，《影迷传》、《腐蚀》、《太太问题》、《我们夫妇之间》、《夫妇进行曲》等私营厂拍摄的坏影片陆续上映。这一系列坏影片的出现，暴露了夏衍、于伶等人在领导上海私营电影业中执行的一条取媚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4月17日 周扬在旧电影局干部会议上说：“现在，不是追究责任问题，而是要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使我们的思想提高一步。”企图掩盖这场开国初期两个阶级生死搏斗的政治性质。

由于周扬等人的抵制，《荣誉属于谁》只在电影界内部进行了所谓“讨论”。江青同志后来指出：对《荣誉属于谁》的批判是不彻底的。

5月20日 毛主席亲自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发表了！社论尖锐指出《武训传》的反动性，并对大吹大捧《武训传》的反革命文艺黑线头目进行了严肃的责问。毛主席说：“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

（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一个群众性的对《武训传》的大规模批判运动，在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下，冲破周扬一伙的反革命阻力，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6月 胡乔木、周扬对毛主席关于批判《武训传》的指示采取抗拒的态度，周扬只是在旧文联组织一些反动“权威”座谈过两次。并于6月4日写信给于伶，要他“在思想斗争问题上，具体处理要慎重、仔细，不可急躁鲁莽”。大耍假批判、真包庇的阴谋，保护其党羽。上海报刊上出现许多文章，宣扬《武训传》问题“你，我，他都有份”，大放烟雾，制造混乱，掩盖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遏制革命力量进行反击。有的干脆赤裸裸为武训的吹捧者辩护，说他们“本质上是进步的，只是思想认识上犯了错误”。

6月 江青同志直接领导的“武训历史调查团”组成。去武训家乡山东堂邑、临清、馆陶一带进行了二十多天的调查。调查团与周扬派去进行破坏的右派分子鍾惦棠（当时周的秘书）作了斗争，克服了重重困难，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

7月23日——28日 《人民日报》连续刊载的毛主席亲自修改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以大量丰富确凿的历史事实，令人信服地说明：“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7月28日 江青同志遵照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在电影指导委员会上提出电影工作者要长期深入工农兵。她说，编剧现在深入生活的方法有问题，下去观察了一点生活，立刻抓回来写，这样不能产生有血有肉的作品。江青同志还批评了当时电影创作的不良倾向，她指出：《荣誉属于谁》搞歪了；《人民的战士》必须修改，因为它表现了悲观失望情绪。她说，不应专搞大的，应该大小兼顾。她对电影批评发表了重要的意见，指出：批评必须分清界线，区别什么是革命的，什么是反革命